

王詩穎，《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，1924-1945》，臺北：國史館，2011年，236頁。

此書定名為《國民革命軍與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形塑，1924-1945》。顧名思義，重點是探討戰爭中的「男性氣概」，而正如作者在「緒論」所言，研究對象是國民革命軍，研究的主要時段則涵蓋北伐之前的黃埔軍校、北伐戰爭、剿共戰爭及抗日戰爭。王詩穎強調此研究不限於戰爭及衝突的描述，而是以男性研究的角度，在話語、意識形態及文化意涵方面，分析「男性氣概」在國家、軍隊、知識分子，以至女性角色各方面是如何形塑出來的。

作者所採用的參考資料，主要是戰時的軍事出版作品，例如《黃埔生活週刊》、《抗戰漫畫》、《掃蕩報》等等。作者指出由於這些作品主要由男性軍人執筆，因此可以用來探討戰時的男性軍人如何定義「男子氣概」。透過這些書寫，我們可以窺探男性軍人的形象是如何建構的，以及這時期所形塑的「男性氣概」典範的特點。從結構而言，全書共分五章，除了「緒論」及「結論」，其餘三章為核心內容，都圍繞着中國「男性氣概」的主題去分析。先以傳統社會男性的特點作出溯源，然後過渡至近代，以北伐前的黃埔軍校、北伐戰爭、剿共戰爭及抗日戰爭等時段，去呈現出戰爭與「男子氣概」之間的互相聯繫及其具體狀況。

首章為「形塑『新男性』：近代中國男性氣概的轉變」，作者以四個主軸分析近代中國「男性氣概」的轉變，包括傳統社會男性的性別特質、「男性氣概」的形塑歷程、軍人作為「男性氣概」的載體、近代化的軍事教育和訓練。在傳統社會男性的性別特質方面，以雷金慶(Kam Louie)的 *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: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* 一書中「文」、「武」男性的分類為基礎(Kam Louie, *Theorising Chinese Masculinity: Society and Gender in China*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2002)，提出了傳統儒家經典對「武」的看法。隨後，作者對不同朝代的男性性別特質作出概括，例如宋明以後「男性氣概」有「柔性化」的趨勢；清中葉國政衰落，面對西方的侵略，尚武的「男子氣概」再度得到提倡等等。

在「男性氣概」的形塑歷程方面，王詩穎提出了知識分子、國家、女性角色如何形塑出「男子氣概」，例如清末的一般百姓都因「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」的觀念，並不願意學習武事。其後，中國受到西方國家的入侵，知識分子提倡尚武，軍事參與成為「男子氣概」的重要表徵，展現出民族精

神。軍人作為「男性氣概」的載體，主要是在國家、知識分子和地方人民的視野內。軍人是展現「男性氣概」的最佳身份，例如作者引用阿英所編纂的《晚清文學叢鈔：說唱文學卷》中的〈國無魂〉云：「堂堂中國好男兒，誰能含笑沙場上」。因此，中國男性需要從軍，擔當國家存亡的責任。在近代化的軍事教育和訓練方面，作者探討了清末的新式軍事訓練，如張之洞的自強軍、袁世凱的北洋新軍的募兵制度及練兵所建構的「男子氣概」等等。

第二章為「形塑「新軍人」：北伐前的黃埔軍校」，作者解釋以蔣介石與黃埔軍校作為分析「男性氣概」對象的原因，是在於軍校是建構「男子氣概」的主要機構。在軍校時期，男性身體是最能展示「男子氣概」的部份，如蔣中正訓誡學生：「要曉得進校以後，你們就要獻身於黨，為國犧牲了。」嚴格的軍紀使黃埔軍校學生都符合軍校理念的「男性氣概」。在紀律方面，蔣中正主張同胞情誼、「去女性化」的重要性，軍人需要學習英雄典範，如岳飛《滿江紅》等。

第三章為「展現「男性氣概」：北伐、剿共與抗日戰場中的實踐」，作者的研究對象為國民革命軍，主要呈現出國民革命軍在北伐、剿共與抗日戰爭中所展現的「男性氣概」。如前文所述，作者主要是以戰時的軍事出版作品分析其建構的理想男性軍人形象。在北伐戰爭方面，作者以《黃埔生活週刊》為主要探討的史料，當中有強調死亡是強化「男子氣概」的一種方式，故此在該刊的文章中往往對光榮死去的男性多所頌讚。

另外，在剿共戰爭方面，作者以畫報《好男兒》中的文藝圖片分析「男子氣概」，圖片中的軍人都是衣裝整齊、發揮同胞情誼的。女性在建構「男子氣概」方面也擔當輔助的角色，因為她們不但在前線救護男性，也在後方負起宣傳的責任來鼓勵男性參戰。至於在抗日戰爭方面，作者以軍事報紙《掃蕩報》為主要參考資料，指出報章中所提倡的「男子氣概」，其實包括責任感、榮譽、正直等。為了鼓勵男性參戰，報章中的社論及文藝作品均致力鼓吹建立從軍「好男兒」的形象，也往往提及女性鼓勵男子上戰場殺敵。

王詩穎指出過往研究者大都只是針對戰爭的事件作出討論，而從性別視野切入，探討戰爭及性別關係的成果仍然相當缺乏。其實，過往有關中國歷史上軍事與性別結合的研究，對象普遍為女性，例如西方的研究有 Victoria Baldwin Cass 的 *Dangerous Women: Warriors, Grannies, and Geishas of the Ming* (Lanham, Maryland: Rowman & Littlefield Publishers, Inc., 1999)，而內地及臺灣的研究則有王子今《中國女子從軍史》（北京：軍事誼文出版社，1998）、蔣竹山〈女體與戰爭——明清厭砲之術「陰門陣」再探〉（《新史

學》, 10卷, 3期〔1999年9月〕, 頁159-187) 等等。事實上, 以軍事及性別結合的研究成果未見豐盛。作者以「男性氣概」為視角來分析1924年至1945年之間中國軍事與性別千絲萬縷的關係, 的確帶來不少新意。

當代女性及性別史權威學者曼素恩(Susan Mann)已提出在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領域中, 「男性氣概」及性別關係等議題應受到重視(Susan Mann, "AHR Forum-The Male Bond in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," *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*, 105: 5 (December, 2000): 1600-1614)。王詩穎以戰爭結合「男性氣概」進行研究, 委實可以開拓男性研究的空間及議題, 也讓學界重新思考以性別視角分析戰爭史的方法。軍人的形象及其建構, 本身就呈現出「男性氣概」的典範。另外, 作者加入女性角色來輔助分析「男子氣概」, 除可收相輔相成之效外, 也有助重申「性別研究」不能只集中在某一性別, 要考慮到不同性別的立場, 才可更有效地呈現出整體的性別面貌。再者, 在分析「男性氣概」的呈現方面, 作者先對中國傳統社會呈現的「男性氣概」概況作出溯源, 然後才過渡至民國時期, 從而帶出「男性氣概」的發展軌迹, 亦是此書優秀之處。

對於此書的取材, 筆者認為可稍作補充。首先, 作者追溯近代中國「男性氣概」的轉變, 似乎可以更進一步參考不同性質的文本。例如作者提出晚清志士鼓吹尚武, 而尚武之聲見於文學作品中, 並以《晚清文學叢鈔: 說唱文學卷》為主要例子, 但是筆者認為可以擴大參考文本的範圍, 從而加強論證。此外, 作者也用過梁啟超《飲冰室文集》為例。然而, 清人文集中提及晚清尚武風氣的例子仍多, 例如鄭觀應云: 「明治始維新, 借此以自鏡, 舉國皆尚武, 合群共爭競, 圖強得自存。」(鄭觀應, 〈答汪甘卿孝廉〉, 見《羅浮倚鶴山人詩草》〔清宣統元年本〕, 卷2); 張之洞提出「所以將士皆能知忠愛, 厲廉恥者, 其道有一, 曰尚武功」(張之洞, 〈兵學第十〉, 見《勸學篇》〔清光緒二十四年中江書院刻本〕, 卷下); 俞樾亦云: 「故國乃尚武, 君以武舉魁其儕伍。」(俞樾, 〈程蕙滋像贊〉, 見《春在堂雜文》〔清光緒二十五年刻《春在堂全書》本〕, 卷6)。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。

另外, 作者雖然概括了由帝制時期, 以至民國年間「男性氣概」的整體發展, 但是筆者認為還可以更深入地探討不同階段「男性氣概」轉變過程中的特點。記得黃衛總(Martin W. Huang)《中華帝國晚期的男性構建》(*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*)曾列舉中國「男性氣概」這一課題可以再供仔細研究的方向: 「傳統文人轉變為現代的知識分子, 當中的

中國男性經歷了什麼性別的轉變？而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，傳統的『英雄』及『好漢』形象，如何幫助重新發現不同形態的『男性氣概』？」(Martin W. Huang, *Negotiating Masculin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*, Honolulu: University of Hawai'i Press, 2006, p. 203)。黃說甚是。其實，哪些「男性氣概」的特點在不同階段也是共有的？哪些特點是有異於帝制時期的？而男性成為軍人，常到戰場殺敵及接受嚴格的軍訓，是否理所當然地能維持「男性氣概」？若果民國時期的男子不能從軍，又有否其他途徑表現自己的「男子氣概」？再者，我們不能否認男性在社會處於主導角色，但男性對於女性在戰爭的輔助角色的理解，又有沒有滲入男性本位的認知？身為國民的男性是需要堅持男性至上的原則，還是會因社會環境、思想的改動，而對女性角色的看法有所轉變？此外，軍人的家族傳承中，又可有長輩對後輩的訓誡文獻，可供窺探他們對「男性氣概」的堅持？軍人社群中的人際關係，也可以有所著墨。以上皆為筆者一些方向性的建議。

總括而言，王詩穎這部新著是有貢獻的。全書採取男性研究的角度，以性別鏡子來分析軍事，為近現代中國戰爭的歷史提出了重要的詮釋。同時，也證明了「男性氣概」的研究極具延伸討論的價值，可以為現存的「性別研究」帶來新視野及衝擊。

何宇軒

香港浸會大學歷史學系

李君山，《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（1931-1936）》，臺北：文津出版社，2010年，530頁。

近年來，隨着蔣介石日記的公開，臺北國史館的《蔣中正總統檔案》亦愈加受到學人重視。利用蔣檔和蔣介石日記進行民國史研究成為一股熱潮。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李君山於2010年出版的《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（1931-1936）》便是在充分利用蔣檔的基礎上著成的研究成果之一。

關於全面抗戰前的中日關係，涉及到中日兩國的內政和外交，可從政治、軍事、派系鬥爭、人脈關係、經濟互動以及條約協議的交涉等各方面展開探討。中日兩國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成果不勝枚舉。日本學者多針對日方因素，在日本對華政策上的研究頗下功夫。而中國方面，大陸和臺灣學者的